

历代 箴铭 选读

● ●
马文熙 编著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马文熙
编著

历代箴铭选读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历代箴铭选读

马文熙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9.75 字数: 213千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9,700册

*

书号: 3088·459 定价: 2.45元

用本

儆己戒人箴铭简介

马文熙

古代儆己戒人的箴铭，对于现在的许多人，已是相当陌生了。然而，箴铭中的菁华，却是祖国的瑰宝。

自三代以至有清，绵绵两千余载，箴铭络绎不穷。“官箴王阙，古之宜也”，“作器能铭，可为大夫”，君王将相、文人学士、佛家道门，都有人呕心沥血於箴文、铭文的写作，直抒胸臆，讽刺时弊，总结人生的经验，阐述处世之哲理，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作品。前人编纂的总集、类书中虽有收集，但或失之於数量过少，或失之乎鱼龙混杂，糟粕淤积而菁华湮没。那些闪耀着哲理性、人民性光辉的箴铭，大多散见於个别作家的文集中，整理、编选者寥寥无几。为了给文学爱好者开辟一个新的天地，为广大读者（特别是青年读者）提供文明之邦的思想玑珠，以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，我们披沙拣金，编成此书。

一、箴、铭的起源

从起源和用途看，儆己戒人的箴、铭是有区别的：“箴诵於

官，铭题於器。”①

“箴”，亦写作鍼、针，本义为缝衣服的针。即荀况《赋篇·箴》描述的“无知无巧，善治衣裳”、“既以缝表，又以连里”。箴又可用于治病，名医扁鹊曾说：“疾在腠理，汤熨之所及也；在肌肤，鍼石之所及也。”②因箴能治病，渐渐引申为规戒之意，郑玄云：“箴，谏诤之辞”，即就此义而言。

早期的箴，尚未定型成一种文体，只是规戒性的言辞，字数多寡，句式长短，有韵无韵，均无定制，而且不限于“官箴王阙”，国君对臣属，臣下对君王，都可“箴”。西周末，卫武公“年数九十有五矣，犹箴儆於国。曰：‘自卿以下至於师长士，苟在朝者，无谓我老耄而舍我，必恭恪於朝，朝夕以交戒我，闻一二之言，必诵志而纳之，以训导我’。”③这是国君规戒臣属。“楚自克庸以来，其吾（楚庄王）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，…箴之曰：‘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’。”④此为君王儆戒臣民。

“昔楚灵王不君，其臣箴谏以不入。”⑤“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，命百官官箴王阙。”⑥均是臣下箴儆君王。有的时候，有的诸侯国，并非百官都可作箴，箴的职责专属於某些职官。《周语》记载，邵公谏周厉王曰：“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……而后王斟酌焉。”韦昭注“师箴”：“师，小师也。箴，箴刺王厥，以正得失也。”可见，周天子有小师专门担负箴规之职。有的侯国，如楚国，把谏官称作“箴尹”，其职责是“劝善”，高诱说：“楚有箴尹之官，亦谏臣。”⑦

箴作为“攻疾防患”的独立文体，是在规戒性言辞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。刘勰说：“斯文之兴，盛於三代。夏商二箴，余句颇存。周之辛甲，百官箴阙，惟《虞箴》一篇，体义备焉。迄至春秋，微而未绝。战代以来，弃德务功，铭辞代兴，箴文萎绝。

至杨雄稽古，始范《虞箴》，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。”⑧寥寥数言，概括了直至汉代的箴文兴衰复盛史，基本可信。《虞箴》保存在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中，是掌田猎之官“虞人”借夷羿因喜田猎而亡国的教训来规戒周王的：

芒芒禹迹，画为九州，经启九道，民有寝庙，兽有茂草，各有攸所处，德用因不扰。在帝夷羿，冒贪于原兽，忘其国恤，而思其麇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。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

《虞箴》大致为四字韵文，内容又是谏海，可看作箴体正式形成的标志。汉代杨雄，仿效《虞箴》作二十五官箴，在箴文的创作上有承先启后之功。从此，箴文绵延不断。

铭文之“铭”，从金名声，当产生于铜器出现之后。我国的夏、商、西周、春秋等几个时期属青铜时代，商至春秋的铜器上，常有铭文。铭文的内容主要为两类：一类标明器名或物主，如商后期标明“司母戊”的鼎，越王勾践剑上的八字铭文：“越王鸠（勾）浅（践）自作作用剑”。一类记载祭祀、征伐等大事。有些铭文在记叙中或颂扬功德勤劳，或总结经验教训。如西周初“大盂鼎”内壁铸浇的二百九十一字铭文记载了周立国的经验和殷亡国的教训，并歌颂了文王、武王。

以“铭”命文的铭文，出现在青铜时代的中后期。假如站在名实相符的角度，姚鼐说“三代以来有其体矣”，是客观的。商汤的《盘铭》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就可能铸刻于铜器，也就是说，既有“铭”之名，又有铸金之实。然而，三代的铭也有不铸器的。《大戴礼记·武王践阼》记载：“王闻书之言，惕若恐惧，退而为戒书。於席四端为铭焉，於鑑为铭焉，於盥盥为铭

焉，於楹为铭焉，於杖为铭焉，於带为铭焉，於爵豆为铭焉，於户为铭焉，於牖为铭焉，於剑为铭焉，於弓为铭焉，於矛为铭焉。”

席、楹（屋柱）、杖、带（衣带）、户（门），均非铜器，无法铸文，铭文只能是织、写、刻在这些草木制品上，所以前人解释说“铭，题勒也”，既有“题”（题写），又有“勒”（雕刻），看到了此类铭有些是名实不符的，即有“铭”之名而无铸金之实。后代许多儆己戒人的铭文，铸金者有之，题写者有之，而且题写多於铸金，就是上承三代之制的。

铭文的起始，刘勰认为要从黄帝、大禹算起。相传黄帝有《巾几之铭》：“毋翕弱，毋傴德，毋违同，毋傲礼，毋谋非德，毋犯非义。”大禹勒“箕箒”（悬挂钟鼓的竹木架）招谏：

“教寡人以道者击鼓，教寡人以事者振铎，语寡人以忧者击磬，语寡人以讼狱者挥鞀。”从内容看，这两则铭文当是后人伪托；从题勒的器物看，均非铜器，所以，“铭”字也是后人追加，象黄帝的《巾几之铭》，蔡邕《铭论》称《巾几之法》，胡宏《皇王大纪》作“舆几之箴”，就是确证。不过，这些传说中的“铭文”也给了我们启示：后代铭文的雏形，可能产生於题器、刻木。

二、箴、铭的类别

是否刻石勒器，是箴文、铭文的相异之处。但历代许多文体论者常把儆己戒人的箴铭看作一类文体，则又是根据“名目虽异，而警戒实同”的标准归类的。我们基本赞同这样归类，下文也大体上视箴铭为一类。说“大体”，是因为“箴全御过”，而“铭兼褒讚”，其间仍有不同。

蕴含“警戒”内容的箴、铭，主要有器物铭，儆戒铭、箴，宫室铭、箴，山川铭。

1. 器物铭。以周围具体器物为对象，小至片纸滴水，大至舟车门柱，或因器作戒，或述其功美。作者往往能准确抓住客观事物的某一特点加以发挥，立意新颖，耐人寻味。譬如：

抓住形状特点施展想象的——

纪昀《破叶砚铭》：“虫之蚌叶，非方非圆。古之至文，自然而然。”

金农《缺角砚铭》：“头锐且秃，不修边幅。腹中有墨，君所独。”

袁枚《井田砚铭》：“耕於田，夜得息；耕於砚，夜兀兀。问胡不休？日期所收，千万年后，乃始有秋。”

抓住用途特点发抒议论的——

卢仝《栲（梳）铭》：“人之有髮兮，旦且思理；有身有心兮，胡不如是？”

王祹《栲铭》：“髮之乱也，可以理之；政之弊也，曷以治之？”

刘向《杖铭》：“历危乘险，匪杖不行；年耆力竭，匪杖不彊。有杖不任，颠跌谁怨？有士不用，害何足言？都诸蔗虽甘，殆不可杖；佞人悦己，亦不可相。杖必取便，不必用味；士必任贤，何必取贵？”

抓住位置特点进行劝戒的——

傅玄《冠铭》：“居高无忘危，在上无忘敬。懼则安，敬则正。”

苏轼《徐州莲华漏铭》：“……使凡为吏者，如舩之受水，不过其量；如水之浮箭，不失其平；如箭之升降也，视时之上下，降不为辱，升不为荣。则民将靡然而心服，而寄我以死生矣。”

周武王《门书》：“敬遇宾客，贵贱无二。”

抓住形成特点诲人戒己的——

王祹《尺铭》：“百分之积，乃成乎尺。尺而复累，吾不知其止。学之为功，固如是。”

方孝孺《尺度铭》：“寻丈之缪，实始毫厘。君子畜德，无忽细微。”

纪昀《水滴铭》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慎尔所染，勿玷尔德。”

2. 儆戒铭、箴。不是针对一器一物而发，而是直接对伦理、道德、修养、政事等发表感想。这一类里，铭较少，常见的有“座右铭”；箴的比重极大，可以说大部份箴都属此类。从每篇儆戒铭箴内容广狭来分析，有两种类型：一种，广泛总结人生的经验，治国的教训。严遵《座右铭》涉及到言语、嗜欲、货利、嫉妒、谄佞、残酷、陷害、淫戏、忠孝、节俭等问题；陈亮《上光宗皇帝鉴成箴》则从无涵酒色、登崇俊良、斥退姦佞、重视民众、根绝私赏私刑、防微杜渐等十几个方面劝谏帝王。可以说兼容并包，鞭辟入里。另一种，仅就某一问题深入解析，象审听箴、行箴、坐箴、友箴、忧箴、怠箴、益量箴、毁誉箴等都是。譬如赵坦的《躁箴》，列举了“精金百炼，乃成百刀”、“古镜湔磨，乃鉴秋毫”、“蚁缘不已，登彼树颠”、“鹰搏不已，翻摩苍天”、“昔在愚公，志在移山”等通俗事例传说，说明“德由层累，学或毕生”，只要“志定於己，不急不怠”，就可“跬步千里”，但“苟涉於躁，必毁其成”。王守仁《严师箴》围绕怎样才称得上“严师”，提出诸多标准：“庄敬自持，外内若一”，“施教之道，在胜己私，孰义孰利，辨析毫厘”，“毋忽其细，慎独谨微”，“毋事於言，以身先之”，教“由诚”、“以序”。真是言近旨远，抓住要害。

3. 宫室铭、箴。和记载某建筑物兴建缘由、过程、规模、主事者等内容的宫室碑不同，这类铭、箴题目上有某某室、某某斋

字样，如《日省斋铭》、《喜闻过斋箴》，但并不涉及其兴建、规模等事项，而是仅就斋室的命名展开联想，儆己戒人。象虞集《益斋铭》，就紧扣“益”（增益）字做文章，指出“人有不足，则必求益：小人于利，君子于德。虽同于求，实异於物，是故学者，当谨所择”。姚椿《据德室箴》围绕“据德”的难易告诫人们：“闻道非易，守道尤难。弗惮其远，弗畏其艰”，只有象颜回、曾参那样有勇气“省其私”、“三省吾身”，才有希望成为贤德之人。

4. 山川铭。根据山陵河道的自然特点或历史沿革，评论政事人伦的臧否得失，寄托作者的希冀恨爱。赵秉文《骊山铭》通过“骊山之势，其址不大，其祸则大；骊山之泉，其流不长，其祸则长”的正反写照比较，告诫统治者要牢记秦始皇、唐玄宗因建骊山陵、华清宫而导致民怨沸腾的教训，以免重蹈复辙。陆龟蒙《马当山铭》从太行山、吕梁川之险写到马当山的可怖：“屹於大江之旁，怪石凭怒，跳波发狂，日黯风助，摧牙折樯，血和蛟涎，骨横鱼吭。幸而脱死，神魂飞扬”，进而笔锋一转，控诉他认为的小人：“合是三险而为一，未敌小人方寸之包藏；外若脂韦，中如剑铍，蹈藉必死，钩繫必伤。在古已极，於今益昌。”这种肺腑之言，饱融着痛心疾首的血和泪。在山川铭中大多数是歌功颂德的，“谏诲之辞”数量极少。

三、箴、铭的语言特点

就语言形式而言，箴铭可以并入更大的文体门类：诗。有些作者自己就是把箴铭看作是诗的，元人戴良《喜闻过斋箴·序》云：“古之人苟有过焉，必喜人规，故其德日滋。今之人苟有过焉，必忌人知，故其德日隳。呜呼，生今之世而可不思古之时

乎？诗以箴之，其殆庶几也已。”《退思斋铭》曰：“君之过兮我知，我之过兮正者其谁？出入是斋兮鉴此铭诗。”箴铭作为诗，特点非常显著：语言形式上受到诗三百和汉魏古诗的直接而巨大的影响，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：

1. 句式以四言为多、杂言次之，亦有三言、五言、骚体等。

四言

方孝孺《席铭》：燕安溺人，甚於洪波。身溺可济，心溺奈何？

姚椿《自箴》：嗜欲之始，必有其根。迺乘於邪，迺诱于昏。频复斯厉，频巽从则吝恨。尔不自强，夫复何恨？

杂言

傅玄《镜铭》：人徒览於镜，止于见形。鉴人可以见情。

陆耀《仕箴》：上不阿，中不随，下不苛。持是三者，以游乎世，其庶免於君子之诃。

三言

王祎《匱铭》：虚其中，厥有容。维能容，久则充。

五言

方孝孺《朋友箴》：损友敬而远，益友宜相亲。所交在贤德，岂论富与贫？君子淡如水，岁久情愈真。小人口如蜜，转眼如仇人。

骚体

蔡襄《步箴》：有足兮动涉坦夷，有心兮何由险峨？足非有患兮心役之为，用心如足兮蛮貊行之。

这里顺便提一下，古人常从广义的角度把深刻的警句格言看作“铭”，这样的“铭”不是诗，其句式也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，如陆放翁《跋吕文靖门铭》：“一言可以终生行之者，其

‘恕’乎！此圣门一字铭也。诗三首，一言以蔽之曰：‘思无邪’，此圣门三字铭也。”就是谈的广义的铭。

2. 韵式和诗经、汉魏古诗一脉相承。首先，韵脚很密。有句句用韵的，如周武王《觴铭》：“乐极生悲，沈湎致非，社稷为危”，“悲、非、危”押韵；有偶句用韵的，如太平天国时代的《耳箴》：“任他喧万籁，我自静中听。莫把邪声入，聪虚分外灵”，“听、灵”为韵；有不定句用韵的，如方孝孺《幼仪杂箴·饮》：“酒之为患，俾谨者荒，俾庄者狂，俾贵者贱，而存者亡。有家有国，尚慎其防”，“荒、狂、亡、防”为韵。韵疏的箴铭不多，象严遵《座右铭》，全首四十余句，仅七处用韵；田锡《用材箴》除首尾韵较密外，篇中“尧以仁化，舜以孝理，稷专播谷，禹务导水”四句无韵，前后韵相隔较远。

其次，箴铭用韵较宽，押韵比较自由，虽经律诗这一用韵严格的文学样式的影响，仍一本其旧，连唐代近体诗大家写作箴铭时亦谨谨守之。韵宽表现在四方面：

既可押平声韵，也可押仄声韵，此其一。纪昀《小等铭》“所系虽轻，亦务使平。盖千万之差，生於毫忽之畸零”，“轻、平、零”系平声韵；翁方纲《复初斋坐右箴》：“昔王半山，学废庆弔。自我言之，学宜併废游眺。岂但已哉？学宜併废谈笑。……”“弔、眺、笑”系仄声韵。

有一韵到底的，也有换韵的，此其二。如崔瑗《座右铭》“长、忘、纲、伤、臧、光、强、量、祥、芳”均属“阳”韵；而周武王《衣铭》“蚕桑苦，女工难。得新捐故，后必寒”，单句“苦”、“故”押韵，偶句“难”、“寒”押韵，两韵有规律地交叉进行（可称为交韵）；皮日休《足箴》：“惟尔跼跼，为吾所先。居必择地，行必依贤。勿践乱阶，勿履利门，勿蹈怨府，勿蹶祸源。凤凰乃禽，不棲凡木；鸞虞乃兽，不践生物。惟

尔棲踐，保慈无忽”，偶句“先、贤”一韵（先韵），“门、源”一韵（元韵），“木”、“物”、“忽”通韵（分属“屋”、“物”、“月”三部），系无规则的换韵。

押韵不限同部，邻近的韵可以视作一韵而通押，此其三。白居易《续座右铭》：“勿慕贵与富，勿忧贱与贫；自问道何如，贵贱安足云？闻毁勿戚戚，闻誉勿欣欣；自顾行何如，毁誉安足论？无以意傲物，以远辱於人；无以色求是，以自重其身。游与邪分歧，居与正为邻。於中有取舍，此外无疏亲。修外以及内，静养和与真。养内不遗外，动率义与仁。千里始足下，高山起微尘。吾道亦如此，行之贵日新。不敢规他人，聊自书诸绅。终身且自勗，身没貽后昆。后昆苟反是，非我之子孙！”“其贫、云、欣、论（读平声）、人、身、邻、亲、真、仁、尘、新、绅、昆、孙”诸韵，即为“真”、“文”、“元”三部通押。

有不避重韵的（同字相为韵），此其四。王良《孝弟箴》“职、陌、锡”三入声韵通押，其中“孝弟为心，其理自识”，“父兄所为，不可不识”，“识”重韵；“父兄所命，不可不择”，“陷之不义，於心何择”，“择”重韵。上文提到的王祚《匱铭》全文仅四句，也出现重韵“容”。当然，不避重韵的箴铭较少。

箴铭中也有无韵的，但它们也是诗，正如《诗经·周颂》中的《请庙》、《昊天有成命》、《时迈》、《噫嘻》、《武》、《小毖》等篇虽然无韵，⑩人们却仍视其为诗一样。而且，无韵箴铭的产生和存在，很可能是受到这些“经”诗的影响。周武王的《鉴铭》“见尔前，虑尔后”是无韵的，后代无韵之作时有，如李尤《席铭》：“施席接宾，士无愚贤。值时所有，何必羊豚？”方孝孺《食器铭》：“适己而忘人者，人之所弃；克己而利人

者，众之所戴。”司马光《友箴》：“余何游乎？将游圣人之门，仁人之里，非圣不师，非仁不友。可乎？未可。不若游众人之场，闻善而迁，观过而改。”正因为存在无韵箴铭，所以有的总集如张相编撰的《古今文综》把箴铭区别为有韵之作和无韵之作。

我们说箴铭的语言形式主要源於诗三百和汉魏古诗，说箴铭从总体上应归入“诗”类，并不是把箴铭完全等同於三百篇和汉魏古诗。三百篇也好，汉魏古诗也好，大多数都特别重视比兴手法的运用，重视形象塑造和景物描写，重视抒情和叙事的有机结合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。箴铭虽然也继承了比兴手法，但不注重形象塑造、景物描写，而侧重於比较直接的写志、论理，这是它们与诗三百、汉魏古诗的最重要的区别。比如元结的《自箴》，通篇以驳论形式写成：

有时士教元子显身之道，曰：“于时不争，无以显荣；与世不佞，终身自病。君欲求权，须曲须圆；君欲求位，须姦须媚，不能此为，穷贱勿辞。”元子对曰：

“不能此为，乃吾之心。及君此言，作我自箴：与时仁让，人不汝上；处世清介，人不汝害。汝若全德，必忠必直，汝若全行，必方必正。终身如此，可谓君子。

其他箴铭大都以正面立论为主。一切艺术表现手法都是为抒志、叙理服务的。如果说，诗三百和汉魏古诗是以形象感人，那末，箴铭则是以深刻的哲理动人方寸、流声后代。

四、箴、铭的思想内容

儆己戒人的箴铭，同其他繁衍於封建社会的文学样式一样，

其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阶级烙印。这种烙印主要来自“宗经”和“为用”。“宗经”，本是根据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经》、《春秋经》等所谓“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”，^⑩来阐发、海戒。刘勰说：“铭谏箴祝，则《礼》总其端；纪传铭檄，则《春秋》为根。”^⑪“杨雄《百官箴》，颇酌於诗书。”^⑫颜之推云：“夫文章者，原出五经；……书奏箴铭，生於《春秋》者也。”^⑬都是谈的思想渊源。后来，“经”的范围扩大，箴铭作者所据的“经”也不断增多，乃至不仅据“经”，也有取资其他文献、作品来写作的。象虞集《益斋铭》之“益”，取之於《易·益卦》，李至《续座右铭》中“撝谦则天下莫与汝争强”一言，本於《易·谦卦》“撝谦”一语；沈颜《视听箴》云“宫者咸知其宫也，商者咸知其商也，而郑卫惑焉”，其辞征於《礼记·乐记》“郑卫之音，乱世之音也”；方孝孺《朋友箴》“损友”“益友”源於《论语·季氏》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”。魏际瑞《麈尾铭》全文九字：“麈戛戛乎，陈言之务去”，本於韩愈《答李翊书》：“惟陈言之务去，戛戛乎其难哉！”还有因怪诞传说而制铭的，如李莹《财货铭》自序就说：“暇日读梦书，则曰梦虺毒蛇梦粪者获财，因以铭之”，其铭即此发挥：“财货将至，梦寐可寻：或移或虺，乃金乃玉。移可亲欤？虺可翫欤？敢献斯铭，以激贪夫。”“为用”，就是以箴铭为工具，为自己的志向服务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。

宗经和为用的结果，产生了大量糟粕，也出现了不少精华。因为是封建时代的作品，有些优秀的箴铭也会夹杂污垢，不可能百分之百的“纯”，这是自然的。正确的态度应该是：“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，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”，“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。”^⑭假如不

分清红皂白，因糟粕而泯灭精华，“岂非恶稗而并剪其末，恶莠而并掘其苗者哉”！⑤照此办理，李白、杜甫、文天祥都会被一笔勾销。优秀的进步的箴铭是精神文明的体现。精神文明，包括了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思想、行为的准绳，扬弃其体现剥削阶级意志的一面，就可以拿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。

傅玄《被铭》：被虽温，无忘人之寒。无厚於己，无薄於人。

方孝孺《虑远箴》：无先己私而后天下之虑，无重外物而忘天爵（按指仁义忠信）之贵，无以耳目之娱而为腹心之蠹，无苟一时之安而招终身之累。

冯衍《车铭》：乘车必护轮，治国必爱民。车无轮安处？国无民谁与？

皮日休《手箴》：惟尔之指，屈伸由己。勿执乱权，勿树贼子。勿秉非道，勿持非理。勿挤孤危，勿援奸宄。慎握吾操，俾直於矢，慎杖吾心，俾平如砥。剪恶如草，颺奸如秕。……

李商隐《太仓箴》：下或谀我：“过人之聪”，是人甘言，将欲相聒；下或誇我：“秋毫必睹”，是人甘言，将欲相瞽。

从这些箴铭中，我们不也可以受到理想、道德、品行等方面的正确熏陶吗？我们可以这样形容：进步的箴铭是人生的教科书。

在阅读这些人生教科书时，有一个问题特别需要引起重视，即如何对待箴铭中出现的仁、义、道、信、忠、孝等封建道德观念。首要的，应认清它们包蕴着特定的阶级内容，给以实事求是的批判。所谓实事求是，就是既要毫不留情地指出其糟粕所在，又要历史地、发展地给予恰当的评价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仁人志士不断探索，精神文明循着对立统一的规律，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前

进。即以“孝悌”而论，它的有害在于宣扬对父母兄长不分是非地一味盲从的愚孝，从而根绝犯上之患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。孔夫子的学生有子的一席话最能说明问题，他说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^⑩对“愚孝”，古人早有批评，在批评中革新了“孝悌”的含义，如明人王艮在《孝弟箴》中明确指出：“父兄所为，不可不识；父兄所命，不可不择。所为若是，终身践迹；所为未是，不可姑息。所命若善，尽心竭力；所命未善，反复思绎，敷陈义理，譬喻端的。”王艮之前，唐代皮日休《口箴》在批评《金人铭》“多言多败”时，也已指出了愚孝愚忠的消极面：“吾谓斯铭，未足以珍。出为忠臣，言则及君；入为孝子，言则及亲。”这都是进步的忠、孝、悌思想，是我们批判继承的。

站在一般阅读、学习的基点上（而不是立足于学术研讨、政治批判），在清醒地认识忠、孝、仁、义、道乃至是非、善恶等的阶级内容后，我们不妨从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出发，旧词注新义，去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，为新的时代、新的社会服务。“万岁”原是封建时代臣民对皇帝的称呼，不是早已借来祝愿中国共产党、社会主义社会了吗？“真理”原来是形容佛教教义的，现在的普遍用法已和佛教毫不相干了。一九二九年牺牲的中共中央常委杨殷烈士临刑前曾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”^⑪烈士用的是孔子的原话，但“道”的内容已大相径庭。我们阅读箴铭，也应持这种态度。

能否从优秀箴铭中吸取有益的养分，关键在于立场、志趣和决心。方孝孺说：“有志於养生，虽单方曲伎，出闾巷所传，或足以延年。苟为无志，虽授以龙宫之秘藏，亦多死于国医之手。然则书岂有工拙哉？顾用之何如耳。世不善用，则六经千载为空